

学苑文丛



朱大渭
著

六朝史論續編



學苑出版社

六朝史論集編

卷一

一〇〇〇


六朝史論集編



六朝史論集編

六朝史論續編

朱大渭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朝史论续编/朱大渭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77 - 2978 - 8

I. 六… II. 朱…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六朝时代
IV. K237.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4706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厂: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600 册

定 价: 40. 00 元

目 录

关于中国史研究理论指导的三点思考	001
中国史研究学风和治史方法及相关问题	036
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评说	048
中国古代“机械木人”始创年代及其机理考实	052
三国历史与《三国演义》 ——播《三国演义》电视剧答记者问	069
论诸葛亮治蜀	095
千古名将第一人 ——关羽人神辨析	126
马谡判斩真相及刑前先死狱中辨	157
《便宜十六策》和《将苑》军事思想论略	164
关于《晋书》编纂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178
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	204
魏晋十六国北朝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 估测	246
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265
北魏孝文帝改革	290
在庆祝何兹全先生 85 华诞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代前言)	315
《中国通史图说》前言	320
《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前言	324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序	332

《吕布与五原的历史文化地位》序言	336
《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导言	346
读《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350
健笔破旧蹊,鸿篇开新局	
——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362
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	
——《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	374
十六国国别史的一部力作——《前秦史》	388
魏孝文帝研究的新成果	
——《魏孝文帝传》评价	394

后记

关于中国史研究理论指导的三点思考

一、当前史学研究理论指导的分析

中华民族素以治史、学史、用史而著称,故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光辉灿烂文明。我国正式修史,如从孔子修《春秋》算起,距今约 2500 余年;如果从司马迁撰《史记》算起,距今也有 2100 余年。以后历朝盛世大多修撰前朝史,而且政权所设史馆官修史书,并与私人撰史,相互结合,积 2000 余年撰成了我国历史文献最核心的典籍二十五史。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纪实,也是一个民族团结和凝固力的内在依托。尤其是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不断创新的灵魂,也是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和基石。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博古通今”,“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历观各代明君、贤相、名将、著名文人学士,有谁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有谁不从历史典籍中吸取智慧、增长才干!可以说,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无论在任何时期,历史学都堪称庙堂和文化阶层的显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例外。震撼中外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历史研究领域发难的。我们关注历史学科,当然重点是为了认识和掌握人类社会(包括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前进方向,以及 21 世纪我们民族在伟大复兴中如何吸取历史发展盛世的经验和末世的教训,而且历史学科还将担负着在伟大复兴中文化层面的神圣使命。我国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大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科的

空前繁荣。历史学同任何学科一样,越是繁荣发展,就越是呈现出认识角度的复杂多样,首先是理论指导问题。当前,除辩证唯物史观作为主流史学理论外(详后),其他各种史学理论都有新展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可归纳为四类:

其一,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领域,首先在哲学继而在文学、艺术、美学领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打出了反对启蒙思想、反对现代性、反对盲目崇拜科学理性、追求差异的旗号。从70年代开始,逐渐影响到历史领域,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理论层面。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认为,任何事物没有规律性和确定性,而只有模糊性、间断性,以及倒错、变形,等等。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言人。他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首先反映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及1975年出版的《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评论集》;1989年荷兰历史学家安斯密特发表的《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1994年波兰史学家托尔斯基主编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编纂:历史研究方法论文集》,随后还出现如詹京斯的《后现代史学读本》等。根据这些论著,在史学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史家争执的核心问题乃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而双方对“真”的理解完全不同。现代主义史家认为,追求历史真实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恒过程,他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正在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这是一个累积进步的过程。即便某些研究成果,包括史学实体或规律性的结论,在当前的史学实践中被证明是认识不充分的,或者是错误的。但现代主义史家仍然坚信,这是因为人们当前所掌握的材料和认识能力的限制,随着材料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和理论认识的提高,一定能够真实地描述历史,揭示其客观发展规律。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如果历史研究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活动,那么研究者就是历史学中使过去与现实相连的根本要素。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只是一种认识主体与认识对

象之间的关系,它们彼此融为一体,融合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之中。在历史复述之外,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历史。后现代主义者还认为,历史文本完成之后,真实与否要由读者决定。读者选择与自己的风格、习性相近的历史文本,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来接受,并结合当下的情境进行实践,再以此作为判断文本是否真实的根据。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们随时都在把握历史真实,真实也随实践的效用不断在变更。因此,人们可以抛弃那种现代主义的遗骸,即不再认为因为材料更加丰富,史家就会比其前辈对历史认识得更全面、更接近真实。

就传统历史认识而言,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主观认识在历史知识的生存和传播过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这是传统历史认识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在历史认识领域内,后现代主义强调对历史发展中差异的认知,反对以单一的叙事模式来描述世界历史。这将有利于批判历史学从认识论上构成的“西方中心论”。在后现代主义史观的冲击下,推动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开阔了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学、环境史学、新文化史学等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这些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史家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核心理论,批评日渐增长,认为从这种理论出发,不可能正确完整地说明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学者们尖锐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与18世纪以来欧洲的反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否定传统,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并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是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将主体意识推至极端。他们反对真理,否定客观存在”,用“解构”和“颠覆”的方法,把猜测性的理论冒充为有根据的科学。而且后现代主义史家对一些陈旧或不言自明的观点,用十分抽象、艰深与晦涩的概念进行表述,让人们永远无法理解其实质。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后现代史家认为历史只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堆积,通过“解构宏大叙事”,“碎化”历史,将

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纳入历史研究视野。由后现代主义“摧毁”、“解构”和“否定性”等基本理论特征出发,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归结起来,它对历史学科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否定历史学的客观实在性;否定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否定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①

其二,人文主义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是困难的”。^② 这类学者指出,历史学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因而历史学通过人文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人类智慧,乃是一门智慧之学。历史的核心是人,离开了人就没有历史。加之人类本能要求仁爱、友谊、和平、发展等人文关怀。因此,人文性才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本质特征。对此,较多的学者则认为,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特性,那就是求真与人文关怀二者的结合。并认为,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其既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又闪耀着科学理性的光辉。另一些学者则明确提出,科学性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只有在科学性的基础上才能谈人文性。史家应在坚持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的基础上,努力去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完美统一。^③ 显然,后者的认识理念,乃是符合历史客观发展真实的。

① 承蒙我院世界史所所长于沛同志所赐《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大作打印稿,使我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才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凡上述引文皆出自于氏之作。特表谢忱。姜芑《西方历史学的新动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5版。

② 参考李细珠《科学与人文:历史学的双重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18日第3版。姜芑《西方历史学的新动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5版。

③ 参考李细珠《科学与人文:历史学的双重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5版。姜芑《西方历史学的新动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5版。

其三,以考据实证代替历史观。实际上,考据和实证是中外严肃史家常用的治史方法,尤以中国古典史家最为注重。所谓“考据实证”者,即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义理的诠释,资料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物、史事、制度的考辩,以求其真实性。当前,国内关于这类学者的情况较为复杂。有部分学者将这种治史方法作为历史观,将考据实证方法完全等同于历史学。他们提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史家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考辩、整理,尽最大的可能还原这一客观存在。其实质是史料学即历史学。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中期,老一代史家中就有人倡导过。另一类学者,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以及改革开放后外来各类史论的冲击,从而对唯物史观产生犹疑,因此埋头走向史学考据实证之路。此外,主张辩证唯物史观一类的学者,在其构建宏观史学理论和史学实体之前,作必要的某些专题基础研究,有时也是以考据实证论著出现。由于第三类史观的情况较为复杂,包括老、中、青学者在内,人数偏多,因而近几年来这类史学论著繁多。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微观实证论著,已经成为史学之主流”。由于考据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是治史的基本功,又素为我国史家所重视,所以近年来有关论著不仅开辟了一些史学新领域,而且有的史著显示其功力深厚,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这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就宏观地构建中国新史学理论和实体而言,这些论著仍属于基础研究。其实,早在60多年前,李大钊就将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辩与真正的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加以严格区别。他认为一部文献典籍记录,“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①李氏所言“活”的和具有“生命”的历史,乃指全方位立体形的具有变化发展规律的历史。

其四,其他史学论见。有学者认为,历史是客体,而从事研究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重印本。

者本为主体,主客体的合一,即主体真正认识客体的实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永无终极点。再加之学术之外的诸多因素的操控,因而历史学难以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所以史家主观构造的各种史学理论都是靠不住的。还有学者主张,历史学的主要功能是借鉴,以正确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人生未来的发展作决策,这就是史学研究的终极点。也有学者把历史为现实服务简单化。比如,现实社会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认为在古代也不应该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对古代农民战争的进步性也加以否定,并认为历史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可取。现在提倡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人就主张历史上无论当时政权如何反动腐败,人民生活如何痛苦,都不宜改革或革命。否则,会破坏和谐安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的地方上自编的2006年高中历史教科书,号称以文明史为主导,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等,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据编者称:课本的内容是推进更稳定、较少暴力的中国历史观的广泛努力,它将服务于当前经济政治目标。编者不分时间、地点、条件,而把历史与现实完全等同起来了,这显然是违反唯物史观根本原理的。请问,二十五史中哪一部历史没有王朝即国家政权,没有推进国家政权更替的重要战争,没有承载历史实体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等等呢?!如果离开中国历史的这些主题(当然还远不止这些主题),还能称为历史教科书吗?它符合唯物史观吗?这种违反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将使祖国的未来青年们如何看待祖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把他们引向何方?

上述各种史学理论的出现,乃是由于当前国内外各种条件和复杂形势决定的,从国际条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产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两大主旋律;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迅猛增长而崛起,苏联解体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质的变化,从而以美国为首的霸权政治有些削弱;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共同体出现,等等。从国内条件看,我国改革开放深化以后,经济体

制的深刻变革,政治领域的重要革新,人民生活方式的诸多变化,社会成员劳动分配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所有国内外这一切复杂因素,给人们思想观念以剧烈冲击,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使各个学术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出现了空前的活力和繁荣,从而人们学术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在这种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以及中西文化大交融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下,史学研究领域理论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是一种必然趋势。应当指出,前述四类史学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自觉不自觉地否定或不重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实际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同自然界一样,都有客观规律可循。只不过,历史是群体的有思维活动的人创造的,因而历史现象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偶然因素繁多,而且易受操控干扰,又不能用实验的方法去揭示规律。因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更难以发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最根本任务,恰恰就在于探索和发现其客观发展规律,使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既把握住今天,又自觉地创造未来幸福美好和谐的生活。我们发掘和整理各类资料,考辩史实,最终都在于探寻其历史发展规律,我国的古典史家已经认识到此点。从史学发展的规律看,虽然当前辩证唯物史观占主导地位,但任何时候它都不可能独领史坛,而多元化的历史观必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永远存在下去。即便是唯物史观者之间也有理解和运用高下之差别,我们应当面对现实,尊重差别,包容多样。何况,史家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属于主观认识问题,具有自由独立性,只能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由史家用自由思考的方式在追求真理的辩论中,经过史家群体在治史实践中去反复经受考验,何种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越多,越接近历史发展真实,越具有学术权威性,并逐渐被多数史家所接受,那么,这种史观相对而言,在众多史观中便具有一定的优势,或者说在史学发展中占据主流地位。

我个人认为,当前在上述五种(加上唯物史观)类型历史观中,虽然情况较为复杂,但总的说来,只有辩证唯物史观具有史学

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而唯物史观的完整科学体系,乃是马克思吸取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哲学、历史人类学等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又在将辩证唯物主义对世界史研究相结合的实践中加以验证,并在撰写《资本论》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深入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认为唯物史观完整理论体系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需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

这种唯物史观的完整理论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人类社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会历史发展中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斗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形态的更替等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和矛盾运动,我们必须认真反复阅读,并参考有关马、恩论著,加深领会,通达透彻,并以此为指南,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去灵活运用。^① 最终其认识和运用理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理解和运用者本身所具备的史学功力和思考程度,这里借用兵家用兵布阵的一句名言,即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我想这个“妙心”,应当是史家功力和悟性长期磨合的结果。我们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必须时刻牢记: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②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③同时,唯物史观绝不是研究历史的“终结真理”,而是“发展的理论”^④。恩格斯明确宣布:“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

^① 参考田居俭《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81、68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发展的。”^①又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②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封闭的,而是永久开放的。但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史学理论中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因此,我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主要体现在把理论作为一种指南,它不仅没有束缚我们的思想,相反,凭借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可以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广阔天地里纵横驰骋,掌握各个历史领域的相互关系,探讨其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法则,深入纷繁复杂的各种历史社会现象的精微奥妙之处,从而升华出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结论,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我们对复杂多变、五光十色的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去剪裁历史,把唯物史观凝固化、教条化、公式化,使丰富多彩的历史学科变为注释教条和套用公式的贫乏无味的说教。而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是否正确,必须在历史学科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如果其中某些观点同历史客观实际发生矛盾时,也是可以讨论、补充和创新的。正像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创新的一样,唯物史观也是在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创新的。如果我们既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又彻底摆脱一切陈旧的框框模式的束缚,下苦功钻研历史实际,在理论和史实的结合上,使辩证唯物史观中国化,并面对现实,放眼未来,那我们观察历史的视野必然会更开阔,思考会更深切,笔下会更挥洒自如,史学成果的学术水平会更高。不仅会更接近历史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实,也更能适应 21 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关于唯物史观中国化这个理论运用中的关键问题,后面将要详论。

二、辩证唯物史观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实践的回顾

首先,让我们从 80 余年来(从“五四”运动开始)我国史学研究领域发展的回顾,并主要结合魏晋南北朝史这个最为复杂的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史学研究实践和学术成果来考察。我国唯物史观发展的简要历程,如果以“五四”运动和党的成立标志着第一次大发展的开始,新中国的诞生带来了第二次大发展,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突飞猛进,则开创了第三次大发展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各个学术领域出现了新起点,历史研究领域如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论著,对中国史研究向科学化进程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史学论著大发展,尽管受极“左”思潮干扰,仍然取得了突出成就。对此,已有学者详论。^①这里以“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后三个发展阶段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为例,回顾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形势。在第一阶段,可以陈寅恪、汤用彤、吕思勉三人为代表,他们撰成不少史学名著。由于此时政治风云的深刻变化,史学界固有的乾嘉考据学、资产

^① 参考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